

# 平洋墓葬再研究

潘玲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摘要:** 根据铜器的组合以及陶器和葬俗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可将平洋墓葬的40座墓划分出三期,早期墓葬年代为战国早中期,中期墓葬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晚期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晚期。来自长城地带冀北地区的玉皇庙文化因素是平洋墓葬早期的主要外来文化因素,此外还有以内蒙古东区为主的来自于长城地带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来自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在平洋墓葬的早期所占比例最大,在中期明显减少,晚期极少见到。此外还可见到少量来自外贝加尔地区、欧亚草原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 平洋墓葬 分期 长城地带 玉皇庙文化

平洋墓葬位于黑龙江省泰来县平洋镇,是两处隔绰尔河分布的文化面貌相同的墓地——砖厂墓地和战斗墓地的统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4年发掘了这两处墓地,共发掘墓葬118座,并于1990年以《平洋墓葬》为名发表了两处墓地的发掘报告<sup>[1]</sup>。发掘报告的作者根据总结出的陶器演变规律,将两处墓地的墓葬统一分为四期,认为墓地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2002年,笔者和林运先生主要根据对平洋墓葬出土的椭圆形双梁铜泡、金耳饰形制特点的分析,提出平洋墓葬晚期阶段可晚到西汉中晚期,原报告以直颈壶演变线索为基础的分期认识应重新考虑,平洋墓葬是汉书二期文化的墓葬遗存<sup>[2]</sup>。近年,上述关于平洋墓葬晚期遗存年代和文化性质的认识逐渐被学界所认同。但是由于发掘报告只选择性发表了一部分器物的资料,对部分器物的型式划分和登记记录过于简略,因此以发掘报告为基础重新对平洋墓葬进行分期研究存在较大困难。尽管如此,仍有学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探索。2009年,赵宾福先生通过与相关遗存陶器的对比分析,以陶器的形制演变为主要线索,将平洋墓葬的39座墓葬分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至西汉三个期别,这是目前对平洋墓葬最全面的分期研究成果<sup>[3]</sup>。

以往对平洋墓葬的分期研究均以陶器的形制演变为主要线索,那么除了陶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可作为分期依据的线索?平洋墓葬的主体年代在战国时期,目前对长城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诸遗存分期研究最成功的成果,是依据车马器、兵器和工具、带具和装饰品等北方系青铜器的组合变化为依据而进行的分期,其中陶器和青铜器形制的演变线索只是补充和参考依据。平洋墓葬不仅年代与上述长城地带诸遗存接近,而且随葬的青铜器也与前者有密切关系,葬俗也有一定相似之处。因此,借鉴长城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诸遗存分期研究成果及其分期方法,对平洋墓葬进行分期研究,有可操作性。本文即尝试根据以北方系青铜器等金属器物组合变化线索为主要依据,结合陶器和葬俗等方面的变化,对平洋墓葬进行分期研究。在分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文化因素的构成及其发展变化过程。

## 1 早期墓葬

在砖厂墓地,有三种与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长城地带诸遗存所出几乎完全相同的小件青铜器,即齿状饰、蹲踞状虎形牌饰、双孔饰(图一,1、4、6),这三种器物在长城地带流行的时间主要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最晚的可到战国中晚期。齿状饰是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以前长城地带普遍存在的一种器物。双孔饰见于内蒙古东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的墓葬<sup>[4]</sup>。砖厂墓地所出的蹲踞状虎形牌饰见于和林格尔范家窑子墓葬,该墓葬年代在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sup>[5]</sup>。在砖厂墓地,以上三种青铜器绝不与铁器以及其他可判断出年代较晚的器物共存,本文将出这三种器物的8座墓葬认定为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以前的

早期墓葬（见表1）。

与以上三种器物组合在一起出现的，还有两种基本流行年代也在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以前的器物，即双联铜泡和鼓腹铜管。除去 M120 所出的一件残存一半的双联铜泡尺寸较大以外（残长 1.65 厘米），砖厂墓地所出其他绝大多数双联铜泡通长在 0.8 至 1.3 厘米，背面带钮，其形状和尺寸与长城地带所出的非常相似（图一，7~9）。例如玉皇庙墓地共出 1663 枚双联铜泡，通长都在 0.8 至 1.1 厘米之间，其形状和砖厂墓地所出的非常相似<sup>[7]</sup>。砖厂墓地出 18 件鼓腹铜管（即报告中的 D 型铜管），出于 M124 和 M150 两座墓葬（图一，11）。这种鼓腹铜管在长城地带也较常见，东北地区也有少量发现，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sup>[6]</sup>。

除了双联铜泡和鼓腹铜管，以上认定为早期墓葬的随葬品中还有二种器物可进一步证明这些墓葬年代的器物。第一种是 M150 所出的双翼扁铤铜镞（即报告中的 A 型双翼镞），镞身近三角形，后锋斜收，圆脊与扁铤相连（图一，10）。这种双翼扁铤铜镞在平洋墓葬只出此一件，类似形状的铜镞也极少见。根据石岩先生的研究，有略宽双翼和直通前锋的中脊的有铤铜镞在春秋晚期数量已经很少，这种形制的镞是西周时期流行的铜镞形制在春秋时期的遗留，进入战国时期基本绝迹<sup>[8]</sup>。在长城地带和东北地区，只有敖汉旗大哈巴奇拉墓地所出的一件铜镞与砖厂 M150 所出的这件形状最接近<sup>[9]</sup>。大哈巴奇拉墓地出土器物 and 周家地墓地风格一致，后者年代在春秋中期或晚期<sup>[10]</sup>，大哈巴拉齐墓地的年代也应与其相当。第二种是砖厂 M128 所出的敞口壶，这种器物在平洋墓葬仅出此一件（图二，1），其形状与讷河大古堆所出的敞口壶相似（该墓地简报中的 Ca 型壶）<sup>[11]</sup>。大古堆墓地出土铜器中有一部分与长城地带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所出的相似，其中大古堆出敞口壶的 M1 还出 3 件与玉皇庙墓地和砖厂墓地所出形状相似的双联铜泡，铜泡的尺寸也相似。因此，可以认为砖厂 M128 的敞口壶年代也大致与大古堆墓地年代接近。此外，M128 所出的鹿形牌饰、M150 所出的站立状虎形牌饰在平洋墓葬分别只出 1 件（图一，2、3），这两件牌饰与长城地带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同类牌饰有较多相似之处，本文第三部分将做详细分析。

除了以上 8 座墓葬，还有 2 座墓葬也应该是早期的。砖厂 M184 所出绳纹陶壶的纹饰和颈部以下形状与早期墓 M188 所出的绳纹壶非常相似（图二，2），只是在红衣彩绘形状和壶的尺寸方面略有差异。平洋墓葬只出了这 2 件绳纹壶，均口颈部残缺，这种数量极少的绳纹壶应是早期墓葬所特有，因此可将 M184 划入早期墓。砖厂墓地出了 3 件陶鬲，一件是上文提及的口沿外有珍珠纹的出于早期墓 M124 的陶鬲，另外还有 2 件 A 型鬲，其中发表器物图的一件出于 M134<sup>[12]</sup>。M134 所出的陶鬲与 M124 所出的形状和尺寸相似，主要差别是口沿外无珍珠纹（图二，5）。上述二件陶鬲口径 14~15.6 厘米，通高 12~13 厘米，尺寸略小于实用陶鬲，但明显大于明器化的小三足器。相似的形状和尺寸说明这二件陶鬲年代相当，由此出土 1 件 A 型陶鬲的 M134 也可归入早期墓葬（详见表 1）。

早期墓葬所出陶器器类较丰富，但是除了 A I 式直颈壶（报告划分的）、三足罐、平底碗和钵也见于或可能见于其他墓葬以外，其它的陶器在砖厂墓地只出 1 至 2 件，且皆出于早期墓葬<sup>[13]</sup>。随葬陶器的这一情况也能够说明，砖厂墓地早期墓葬的随葬品与其他墓葬的区别明显，不仅铜器明显年代较早，多数不见于其他墓葬，而且陶器也绝大多数也不见于其他墓葬。因此早期墓葬随葬的大多数铜器和陶器都有特有的时代风格。

## 2 晚期墓葬

平洋墓葬共出 3 件椭圆形双梁铜泡（发掘报告称为“单贝泡”），分别出于砖厂墓地 M107 和 M115（图三，1）。M107 还出 3 件金丝拧绕成的耳饰（图三，2、3），这两种器物都是可明确断代在西汉中晚期的器物<sup>[14]</sup>。砖厂墓地 M170 随葬的鸭形壶与通榆兴隆山墓葬和陈巴

尔虎旗完工墓地所出的鸭形壶形制相似,年代也应该在西汉中晚期(图三,4)<sup>[15]</sup>。这样,砖厂墓地有3座可明确断代为西汉中期或中晚期的墓葬:M107、M115、M170。这三座墓葬中只有M107随葬2件以上陶器,有16件陶壶和1件陶碗(图三,7~10)。16件陶壶颈部都较粗,除了1件矮颈壶和2件AⅡ式直颈壶,其余13件陶壶颈部都较高(M107所出的Ⅱ式曲颈壶、AⅢ式直颈壶、2件B型直颈壶都发表了器物图,可以看出它们都有颈部较高的特点),而且砖厂墓地出的7件被报告划分为高颈壶的陶壶中,有5件出于M107。由此可知,陶器以陶壶为主、壶的颈部较高且较粗是该墓地西汉中晚期墓葬的特点(详见表2)。

发掘报告划分出7件高颈壶,5件出于M107,另外2件高颈壶出于M133(图三,11、12),M133还有与M107相同的颈部较高的Ⅱ式曲颈壶和A型直颈壶。除了1件B型碗,M133所出的其他4件陶器都是颈部较高的壶,而且同类型式的陶壶都见于M107。可见,M133不仅所出陶壶都有高颈的特点,且在M107中都有相应的同型式的陶壶。两座墓葬陶器的相似程度说明两者年代接近,即M133也是西汉中晚期的墓葬。

发掘报告将砖厂墓地出土的7件曲颈壶分为2个式,从发表的器物图可知,两个式别的曲颈壶除了纹饰有差别,形制非常相似,可以看做同一型式的器物<sup>[16]</sup>。7件曲颈壶中有4件出于M107和M133,出于M111的1件曲颈壶不仅形状和尺寸与M107所出的曲颈壶非常相似,而且颈部和上腹部所饰的格子状篦点纹与M170的鸭形壶上的格子状篦点纹相同(图三,6)。因此,M111与M107和M170的年代接近,即也为西汉中晚期的墓葬。另外2件曲颈壶分别出于M102和M112,这两座墓葬都随葬器物很少,且陶器均只有1件曲颈壶(详见表3)。虽然这两座墓葬没有出土其他可明确断代的器物,但是可以根据曲颈壶判断这两座墓葬年代也应该与其他出曲颈壶的3座墓葬相似,即为西汉中晚期的墓葬。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砖厂墓地能够确定年代在西汉中晚期的墓葬有M102、M107、M111、M112、M115、M133、M170,本文将这7座墓葬称为晚期墓葬。这7座墓葬中有3座出铁器,随葬陶器绝大多数是壶类,且绝大多数壶的颈部都较粗较高,壶类以外的陶器只有平底陶碗一种,这与早期墓葬的陶器器类组成有很大差别。砖厂墓地所出的5件柳叶形压制石铲(即报告划分的A型石铲)分别出于M107、M111和M133,不见于其他墓葬,可见柳叶形压制石铲是晚期墓葬特有的器物(图三,4)(详见表2)。

### 3 第三类墓葬——出小三足器和支座的墓葬

在上述砖厂墓地可判断为早期和晚期的17座墓葬中,没有一座墓葬随葬有小三足器或支座<sup>[17]</sup>。砖厂墓地出14件小三足器,出于9座墓葬;出47件陶支座,出于14座墓葬。以上出完整小三足器或支座的12座墓葬中,有5座同时随葬小三足器和支座,可见两者是同时存在可配套使用的明器化陶器,本文将出这两种器物的墓葬归为一类。为了叙述方便,简称为第三类墓葬(图四)(详见表4)。

第三类墓葬中既不见可断代为早期的器物,也不见可断代为晚期的器物,那么这12座墓葬和早、晚期墓葬的相对年代关系怎样?是否它们在葬俗方面有自身的特点,是该墓地某一时期所特有的墓葬?我们通过对分析这三类墓葬来回答上述问题。

从葬式方面看,晚期墓和第三类墓的主要葬式都是二次葬、合葬,而早期墓则以一次葬、单人葬为主。除了碗、钵类等形制变化不敏感的器物,第三类墓葬中有3种形制的陶器也见于晚期墓葬:AⅡ式直颈壶、AⅢ式直颈壶、BⅡ式矮颈壶,但是没有见于早期墓葬的陶器。除了泡、圆筒形管、箍、耳环等形制变化不敏感的(或报告器物登记表中没有标明型式无法进一步分析的)铜器,第三类墓葬中出的AⅢ式铜铃也见于晚期墓葬,但是没有见于早期墓葬的铜器。第三类墓葬和晚期墓葬都出铁器,而早期墓葬则不出铁器。第三类墓葬和晚期墓葬中都有墓葬随葬海贝,但是早期墓葬则不见海贝。通过上面的比较不难看出,第三类墓葬



和晚期墓葬的相似之处多，与早期墓葬之间则差别较大（见表 5）。因此，第三类墓葬应该与晚期墓葬的年代接近，与早期墓葬的则相对年代差距较大。

那么，第三类墓葬和晚期墓葬相对年代关系如何？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对比这两类墓葬的铜器和铁器的器类得到答案。第三类墓葬的铜器种类较多，既有 A、B 两个类型的铜铃、针饰、耳环等装饰品，也有工具类的矛、铍，还有属于武器的三翼和双翼有銎铜镞。在晚期墓葬中，铜器中只有铜铃和耳环以及泡、管等装饰品，不见铜质的工具和武器。第三类墓葬所出的铁器只有铁削、管、丝三种，种类很少。晚期墓中不仅有铁削和铁管，还有铁质的镞和矛。通过上述对比不难看出，第三类墓葬的金属工具和武器都是铜质的，而晚期墓葬的武器和工具则都是铁质的。第三类墓葬的铜器器类较多，晚期墓葬铜器则只有装饰品一种。虽然两类墓葬都出铁器，但是第三类墓葬的铁器种类少且不发达，而晚期墓葬则已进入使用铁质工具和兵器的时期。因此，第三类墓葬年代应该比晚期墓葬早，还处于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阶段。由此可以得出砖厂墓地三个类别墓葬的相对年代关系是：早期墓葬最早，第三类墓葬居中，晚期墓葬最晚。第三类墓葬与晚期墓葬的年代较接近，与第一类墓葬年代差别较大（详见表 1、2、4）。

砖厂墓地的用牲情况也反映出第三类墓葬的用牲习俗处于早、晚期两类墓葬之间的过度阶段。砖厂墓地有 40 座墓葬发现有兽骨，发掘报告没有专门统计墓葬出土兽骨情况，根据报告选择性介绍各种葬式的墓葬（13 至 52 页）、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以及陈放情况（52 至 55 页）、兽骨及其他动物骨骼（113 页）三部分对墓葬出土兽骨的介绍，本文归纳出 36 座墓葬出土兽骨情况，列表如下（见表 6）。这些兽骨中多数是以头、蹄等部位代替全牲的殉牲的遗留，可能其中有一少部分是作为一种随葬肉食的遗留，因发掘报告介绍不详细，两者很难明确区分，本文暂统一称为用牲。在可查到的砖厂墓地 36 座出土兽骨的墓葬中，有 3 座早期墓葬，6 座第三类墓葬，5 座晚期墓葬。从上述墓葬数量可以看出，早期墓的用牲墓葬所占比例较小，第三类墓葬居中，晚期用牲墓葬所占比例最高。三类墓葬中都有随葬马、牛、狗的墓葬，其中出马、牛骨骼的墓葬所占的比例在三类墓葬中差别不大，但是随葬狗的墓葬在晚期明显减少，5 座墓葬中只有 1 座，只占 20%。早期墓葬不见羊和猪，而第三类和晚期墓葬都有少量墓葬发现羊和猪骨骼。总之，三类墓葬的用牲状况有两个阶段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从早期墓葬不随葬羊和猪到第三类墓葬开始随葬羊和猪；第二个变化是从早期墓葬和第三类墓葬的大多数墓葬随葬狗，到晚期墓葬只有 1 座墓葬发现狗的骨骼（而且只发现一枚狗的犬齿，与随葬狗的头骨、下颌骨还有很大差别）。在这两个阶段性的变化中，第三类墓葬明显处于早、晚期墓葬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与上文根据随葬器物 and 葬式的分析结果一致（见表 7）。

#### 4 战斗墓地与砖厂墓地的年代关系及平洋墓葬分期

战斗墓地距砖厂墓地 3.5 公里，文化面貌与砖厂墓地相同（**砖厂墓地 21 座墓葬详细情况见表 8**）。战斗墓地与砖厂墓地三类墓葬的相对年代关系，可以通过随葬器物、葬式、用牲等方面的综合对比得出。除去 10 座空墓，1 座葬式不明墓葬，战斗墓地其余 10 座墓葬都是一次葬，都不随葬铁器，用牲畜类只有狗一种，陶器种类较少，以壶为主，此外只有小三足器、支座、碗三种器类。以上情况说明战斗墓地的 10 座墓葬有相似的特征，应属于同一时期。

战斗墓地皆为一次葬，这一点与以一次葬为主的砖厂早期墓葬较为接近，与皆为二次葬的砖厂第三类墓葬差别较大。战斗墓地不随葬铁器，与砖厂早期墓葬相同。战斗墓地占 27% 的墓葬随葬海贝，与砖厂第三类墓葬和晚期墓葬相似，而与早期墓葬不同。战斗墓地用牲皆为狗。战斗墓地用牲种类单一，相对而言与砖厂早期墓葬略接近，同时与砖厂第三类墓葬用

牲中狗占的比例较大且以狗头及其下颌骨为主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是与砖厂晚期墓葬极少用狗(且仅见狗犬齿)相比差别最大(见表9)。综合以上葬俗的对比可见,战斗墓地葬俗介于砖厂早期墓葬和第三类墓葬之间,与早期墓葬的相似性略大于与第三类墓葬之间的相似性。

再从随葬陶器和铜器方面做进一步的比较。战斗墓地的随葬陶器以壶和小三足器、支座为主,器类构成与砖厂早期墓葬区别明显,除了形制变化不敏感的陶碗、个别的直颈壶以外,两者见不到相似的器物(图五、图二)。战斗墓地只有个别陶器与砖厂晚期墓葬的形状相似,如战斗墓地的I式束颈壶与砖厂墓地晚期墓葬M111随葬的I式束颈壶形状接近<sup>[18]</sup>。战斗墓地与砖厂第三类墓葬的陶器相似之处最多。两者都随葬小三足器和支座,另外,战斗墓地的III式直颈壶,与砖厂第三类墓葬M141所出的AIII式直颈壶相似(图四,2。图五,5)。战斗墓地不见砖厂早期墓葬特有的铜器。战斗墓地铜器器类较为丰富,与砖厂晚期墓葬铜器种类锐减、只以各种铜泡为主的特征也差别很大。但是战斗墓地与砖厂第三类墓葬的铜器比较相似,例如两者铜器器类都较为丰富,都有双翼和三翼的管釜铜镞,而且铜镞的形状也很相似(图六)。

综合以上对比分析说明,战斗墓地在葬式、随葬品类别、用牲等葬俗总的特征方面介于砖厂早期墓葬和第三类墓葬之间,与早期墓葬相对略接近。在随葬陶器和铜器的器类和形制方面,战斗墓地明显与砖厂第三类墓葬接近。因此,战斗墓地发掘的12座墓葬兼有砖厂墓地早期墓葬和第三类墓葬的特点,其年代应处于两者之间。

通过以上分析对比,可将平洋墓葬两处墓地的39座墓葬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砖厂墓地的10座墓葬;中期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为战斗墓地的11座墓葬,晚段为砖厂墓地的12座出完整小三足器和支座的墓葬,即前文所指的第三类墓葬;晚期有砖厂墓地的7座墓葬。早期代表性陶器有敞口壶、高、三足罐、折肩瓮,铜器与长城地带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相似,代表性铜器有双孔饰、双联泡、齿状饰、鼓腹铜管、虎形牌饰。中期代表性陶器有小三足器、支座,铜器种类也较多,代表性铜器有双翼和三翼有釜铜镞。晚期陶器以陶壶为主,壶的颈部较高,代表性陶器有曲颈壶、高颈壶、鸭形壶,铜器种类较少,代表性铜器为椭圆形双梁铜泡。葬式从早期到晚期有较大变化,总的趋势是:从流行一次葬发展到流行二次葬,从单人葬为主发展到流行合葬,再到流行人数更多的集体合葬。早期墓葬所出的双孔饰等6种铜器主要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流行于长城地带,如双孔饰见于长城地带内蒙古东区,虎形牌饰与内蒙古东区范家窑子所出的相同,双联泡、齿状饰、鼓腹铜管则在长城地带各区都有发现。长城地带的器物流传至嫩江流域需要有一个时间差,因此,平洋墓葬早期墓葬的年代应该比长城地带出同类器物的墓葬略晚,其年代定在战国早中期比较合适。前文已经说明,平洋墓葬晚期墓葬的年代在西汉中晚期左右。那么中期墓葬的年代应该在早、晚期之间,即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见表10)。

因发表资料有限,且有些墓葬出土器物极少甚至是空墓,因此除了以上39座墓葬,平洋墓葬的其余79座墓葬中大多数墓葬的年代难以确定。

## 5 文化因素分析

平洋墓葬属于汉书二期文化的墓葬,目前这一观点已经被多数学者所支持,其中平洋墓葬的陶器是最能反映汉书二期文化因素的器物,大量存在的长扁铤骨镞也是当地汉书二期文化以及临近地区同时期其他遗存所特有的骨镞形制。本文对平洋墓葬的文化因素分析不包括陶器和骨镞等反映出的本地文化因素,主要分析外来文化因素。

### (1) 来自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

早期墓葬随葬的明确可判定年代的铜器都来自于长城地带,如双孔饰、鼓腹管、双联

泡、齿状饰，其中鼓腹管和双联泡在长城地带各区都有发现，是较为普遍流行的器物。双孔饰发现的数量较少，目前发表的与砖厂墓地所出的形状相似的双孔饰出土于凉城忻州窑子墓地<sup>[19]</sup>，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谢尔塔拉农场也采集或征集到6件<sup>[20]</sup>（图七，1、2）。齿状饰是长城地带流行的连珠饰中的一种，连珠饰分布范围广泛，但是作为其中一种的齿状饰的分布有一定地域性，发掘出土的与砖厂墓地所出齿状饰相似者见于内蒙古的凉城崞县窑子乡墓地（39件）<sup>[21]</sup>、凉城毛庆沟墓地（49件）<sup>[22]</sup>、凉城忻州窑子墓地（少于131件）<sup>[23]</sup>、准格尔旗玉隆太墓葬（1件）<sup>[24]</sup>，以及位于河西走廊的属于沙井文化的甘肃永昌蛤蟆墩、西岗、柴湾岗三处墓地<sup>[25]</sup>，也见于冀北的隆化县转山墓地<sup>[26]</sup>（图七，3~10）。凉城县的三处墓地位于长城地带的内蒙古东区，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玉隆太墓葬位于内蒙古西区，年代为战国中期至晚期早段；永昌的三处沙井文化墓地年代为春秋中期左右至战国早期；转山墓地器物特征与玉皇庙墓地的相似，两者年代也应相当，即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sup>[27]</sup>。相比较而言，齿状饰在内蒙古东区的分布范围最广、发现数量也相对最多。

平洋墓葬共发现13件铜镞，有双翼有铤（1件）、双翼管镞（4件）、三翼管镞（5件）、三翼镞孔（2件）四种形制，可确定为早期的墓葬中只发现1件双翼有铤镞，可确认为晚期的墓葬中没有发现铜镞，绝大多数铜镞出于中期墓葬。平洋墓葬铜镞的独特之处是有管镞的镞所占比例较高，管镞较长且近镞末端有穿孔。带管镞的镞和带镞孔的镞是北方区春秋战国时期铜镞的特有形制，在北方地区的影响下，临近北方的燕、秦等国在战国时期出现少量的带管镞铜镞<sup>[28]</sup>。平洋墓葬的双翼管镞镞有两种，第一种镞身为长三角形，后锋斜收无倒刺（图八，1、2），这种形状的镞非常少见，在年代相当于战国中期的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解村M1发现与其略相似者<sup>[29]</sup>（图八，6）。第二种镞身也为长三角形，较第一种略宽，后锋形成锋利的倒刺，两翼和中脊的下段之间形成不甚明显的血槽（图八，3、4）。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各区中，只有冀北地区的铜镞普遍有长而锋利的倒刺，是该区铜镞最显著的特点，其中玉皇庙墓地出土的2件双翼管镞镞与平洋墓葬所出的2件形制最为接近，管镞末端也有穿孔<sup>[30]</sup>（图八，7、8）。双翼管镞镞虽然是北方长城地带特有的铜镞形制，但是发现的数量很少，例如在玉皇庙墓地只发现14件双翼管镞镞，只占有可辨形状铜镞总数的6%。但是在平洋墓葬的13件铜镞中有4件是双翼管镞镞，比例高达32%，这一点与长城地带差别较大。平洋墓葬的三翼管镞镞的翼部较窄，除了1件管镞较短外，其余的都是长管镞（图九，1~4）。在玉皇庙墓地年代最晚的相当于战国早期的墓葬M174中出土1件三翼短管镞镞，形状与砖厂M186所出的短管镞镞有些相似<sup>[31]</sup>（图九，8），此外在北方长城地带其他地区不见与平洋墓葬三翼管镞镞相似者。但是在与长城地带临近的燕下都遗址的郎井村战国中晚期遗存中发现窄翼的长管镞铜镞<sup>[32]</sup>（图九，6），在北方长城地带中区的清涧李家崖墓地战国早期墓葬中也有发现<sup>[33]</sup>（图九，7），上述郎井村和李家崖所出铜镞形制是中原地区战国时期流行的窄镞身的三翼和三棱镞与北方的带管镞三翼镞结合的产物，这两地还发现其他的明显受中原铜镞形制影响的三翼管镞镞。平洋墓葬发现2件三翼镞孔镞，镞身上均有穿孔，这种形制的铜镞在北方长城地带各区都有发现，是该区域特有的铜镞形制之一<sup>[34]</sup>。平洋砖厂采集的一件三翼有镞孔铜镞的后锋形成倒刺（图九，5），这与冀北地区此类铜镞的特点相同<sup>[35]</sup>（图九，10）。

通过以上对铜镞的分析可知，平洋墓葬占绝大多数的铜镞是有管镞和有镞孔的镞，这两种镞整体上表现出与北方长城地带铜镞具有共同的特征，相对而言，与冀北地区的相似之处较长城地带其他地区更多一些。平洋墓葬的管镞镞多为长管镞的，三翼镞的翼部较窄，这些特征不见于北方长城地带，有可能是本地特有的因素，也有可能是受战国时期燕国等北方诸国新创造出的融合中原和北方特征的管镞镞的影响。

砖厂M188随葬的蹲踞状虎纹牌饰长5.3厘米，背面有双桥状钮（图一〇，1）。随葬同



样虎纹牌饰的墓葬目前只见于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的一座被破坏的墓葬，该墓出 8 件蹲踞状虎纹牌饰，长 5 厘米，背面有双钮（图一〇，2）。这两个牌饰的图案和形状、尺寸都非常相似。范家窑子墓葬位于内蒙古东区，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sup>[36]</sup>。

砖厂早期墓葬的另一件虎形牌饰出于 M150，为一只形状类似虎的动物侧面形象，有出两条站立状的左侧前后腿和向下垂的头部，“虎口张开，利牙竖立”，尾部下垂，表现出虎爪的形状（图一〇，3）。表现出虎的牙齿、虎爪、下垂的尾部的单体虎形牌饰，在毛庆沟墓地 M55 发现过<sup>[37]</sup>（图一〇，5），在内蒙古博物馆也收藏有类似的虎形牌饰（图一〇，4）<sup>[38]</sup>，但是这两件虎形牌饰表现的是抬头行进中的虎的侧面形象，头部与地面呈约 45° 夹角，表现出略弯曲状的四条腿，而不是站立状的两条腿。所以只能说砖厂 M150 的虎形牌饰与毛庆沟 M55 的虎牌饰有一定相似之处。表现出站立状且头和尾部下垂、有直立两腿的动物形牌饰，目前只见于冀北地区，玉皇庙墓地出土 4 件站立状马形牌饰，墓地的年代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sup>[39]</sup>（图一〇，6、7）。砖厂 M150 的虎形牌饰与内蒙古东区的毛庆沟 M55 等虎形牌饰和冀北的玉皇庙文化的站立状马形牌饰都有所不同，又有些相似，更像是综合了两类牌饰的特点。

## （2）来自冀北玉皇庙文化的因素

如果说砖厂 M150 的虎纹牌饰似乎有一部分来自冀北玉皇庙的造型因素，那么早期墓 M128 随葬的鹿形牌饰，则明显来自于冀北地区。砖厂 M128 这件鹿形牌饰为一昂首、两腿蜷曲向前奔驰状的单体鹿的侧面形象，鹿头上有两枝连在一起近似牛角状的角，角后有略凸的耳，前后腿的蹄部上下相叠，在牌饰背面相当于颈部和尾部的的位置各有一个桥状钮（图一〇，10）。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的三个区中，甘宁区、内蒙古区不仅单体鹿形数量极少，而且不见出土地点明确的与砖厂 M128 鹿形牌饰相似的鹿形牌饰；只有冀北区不仅流行单体鹿形牌饰（带饰），而且与砖厂 M128 所出的形状相似。冀北的鹿形牌饰（带饰）分为两种，一种尺寸较小，长约 1.8 至 3 厘米，大多数为圆雕状，中空，中部有纵向穿孔；也有少数不是圆雕的，在尾部有一穿孔，根据出土情况可知它们是大量穿在带子上的起装饰作用的带饰，见于属于玉皇庙文化的延庆玉皇庙墓地<sup>[40]</sup>、宣化小白阳墓地<sup>[41]</sup>、怀来甘子堡墓地<sup>[42]</sup>（图一一，1~4）。另一种尺寸较大，长 3.8 至 4.5 厘米左右，背面或者颈部和腰部各有一个桥形钮，或者只在腹部有一桥形钮，见于延庆玉皇庙 M174、M175<sup>[43]</sup>和涿鹿倒拉嘴墓葬<sup>[44]</sup>（图一一，5~7）。在玉皇庙墓地的晚期，出现带有蜷曲的前后蹄相叠的双腿的马形带饰（图一一，9），这种带饰是玉皇庙文化流行的马形牌饰与鹿形牌饰结合的产物，这种牌饰的出现也反映出前后腿蹄部相叠的飞驰状鹿造型在玉皇庙文化曾非常流行。从倒拉嘴鹿形牌饰颈部的鬃毛，也能看出鹿形和马形牌饰结合的痕迹（图一一，7）。玉皇庙、小白阳、甘子堡墓地和倒拉嘴墓葬的年代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之间，随葬鹿形带饰的玉皇庙 M174 和 M175 都属于该墓地的晚期遗存，年代大致在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冀北的玉皇庙文化衰落后，在辽西地区的凌河类型遗存中出现较多玉皇庙文化的因素<sup>[45]</sup>，属于凌河类型的战国中期的凌源三官甸墓地发现金质的鹿形牌饰，牌饰尺寸较小，只有 3 厘米长，造型明显与玉皇庙文化的鹿形牌饰相似，只不过和倒拉嘴墓葬一样，鹿头上的角变成了独角（图一一，8）<sup>[46]</sup>。砖厂墓地 M128 所出的鹿形牌饰整体与上述玉皇庙文化及相关遗存所出的鹿形牌饰（或带饰）明显相似，其背面在颈部和尾部带桥形钮的做法也与玉皇庙 M174 的鹿形牌饰相似，差别是砖厂 M128 鹿牌饰的鹿角是两只相对弧形弯曲的角，不见于其他鹿形牌饰。另外，砖厂 M128 的鹿形牌饰长 7.3 厘米，明显大于上述其他鹿形牌饰，该牌饰摆放在 3 人一次葬合葬墓的东北角，与玉皇庙文化的放在死者腰部起装饰作用不同。上述差别表明，在砖厂墓地，源自于冀北玉皇庙文化的鹿形牌饰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在腰腹部的起装饰作用的牌饰转变为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器物，其较大的尺寸和独特的鹿角形状说明，这件牌饰很可能

是在嫩江流域本地制造，而不是从冀北地区直接带来的。

平洋墓葬共发现 10 件镂空球形铜铃。战斗墓地发现 7 件，其中 6 件在铃身与环状钮之间有圆柱状颈部（还有一件没有发表器物图）（图一二，1、2）。砖厂墓地共发现 3 件，颈部形状各异：中期晚段墓 M140 出的 1 件顶部有弯折的管状柄，无环钮（图一二，4）；晚期墓 M115 出的 1 件环钮和铃身之间的颈部非常短（图一四，3）；可推测为早期墓的 M126 发现的 1 件有超长的颈部（图一二，5）。球形镂空铜铃在冀北玉皇庙文化墓葬中也有发现，尺寸与平洋墓葬所出的接近。在玉皇庙墓地的 M215 和 M302 各随葬 8 件和 7 件<sup>[47]</sup>（图一二，6、7），在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至春秋战国之际的小白阳墓地<sup>[48]</sup>和甘子堡 M17<sup>[49]</sup>也有发现（图一二，8、9），也见于年代相当于战国早期的滦平梨树沟门墓地<sup>[50]</sup>（图一二，10）。冀北的镂空球形铜铃或者有近圆锥状或圆柱状的颈部，或者铃的顶部外凸连接环钮，形成类似上窄下宽的颈部。冀北有颈部的铜铃与战斗墓地的铜铃颈部形状最接近，而属于平洋墓葬中期晚段的 M140 和晚期的 M115 的铜铃则颈部形状变化很大。冀北出镂空球形铜铃的墓葬可确定墓主人性别的两座都为女性，在玉皇庙 M302 和小白阳墓地、梨树沟门墓地，与镂空球形铜铃共存的还有圆锥形铜铃。平洋墓葬的镂空球形铜铃也有与上述冀北地区相似的特征，例如，随葬镂空球形铜铃的 6 座墓葬中都有女性墓主人，在砖厂 M140，与镂空球形铜铃共存的还有圆锥形铜铃。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平洋墓葬的镂空球形铜铃不仅形状、尺寸与冀北玉皇庙文化的相似，而且也具有与冀北相同的与女性关系密切、与圆锥形铜铃有共存关系的特征。因此，可以认为，平洋墓葬的镂空球形铜铃来源于冀北的玉皇庙文化，在平洋墓葬中期前段，这种铜铃与玉皇庙文化的形状还较为相似，在中期后段和晚期，铜铃的颈部和钮部形状则发生较大变化。

平洋墓葬的五种用牲家畜种类中，狗出现的频率、数量最多，在早期墓葬中狗是用牲数量最多的家畜，在中期早段狗是唯一的用牲家畜，在中期晚段狗是数量和频率仅次于马的用牲家畜。在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地带和东北地区诸遗存中，玉皇庙文化和夏家店文化晚期的周家地类型以狗为最主要的用牲家畜。在玉皇庙墓地，近三分之二的墓葬用牲，其中单纯用狗的墓葬占 48%，在其他的使用几种家畜的用牲中，狗也是参与频率最多的家畜<sup>[51]</sup>。在平洋墓葬的各种文化因素中，极少见到来自周家地类型的文化因素<sup>[52]</sup>，而来自玉皇庙文化的因素则在平洋墓葬早中期遗存中所占比例最高。因此，平洋墓葬早中期遗存以狗为主要用牲畜类的葬俗，最有可能是来自于冀北的玉皇庙文化。

### （3）可能来自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遗存的因素

砖厂墓地早期墓 M150 随葬一件三角形镞身的双翼扁铤铜镞，镞后锋斜收，圆脊（图一〇，5）。这种形制的有扁铤的铜镞非常少见，前文已提及，与砖厂 M150 这件形状最接近的是内蒙敖汉旗大哈巴奇拉墓地发现的一件扁铤双翼铜镞，该铜镞的后锋略直，铤末端略平，与前者后锋斜收、扁锥状铤末端有所不同<sup>[53]</sup>（图八，9）。大哈巴奇拉墓地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晚期阶段遗存——周家地墓地的特征相似，年代也应与后者相当，即在春秋晚期。大哈巴奇拉和周家地等墓地都大量存在与平洋墓葬形制相似的长扁铤骨镞，上述 2 件铜镞的扁铤，应该是借鉴了当地骨镞铤部的形状。

### （4）来自外贝加尔地区的文化因素

在砖厂墓地 M121 中出一件尾部分开的“燕尾形”骨镞<sup>[54]</sup>（图一三，1），这种骨镞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有悠久传统，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在当地西汉时期的匈奴遗存中仍然是最主要的骨镞形制<sup>[55]</sup>（图一三，2）。过去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分尾式骨镞出于西汉中晚期的完工墓地，该墓地文化主体是汉书二期文化，同时受到较多西汉匈奴文化的影响<sup>[56]</sup>（图一三，3）。砖厂 M121 的这件分尾式骨镞，无疑是来自于外贝加尔地区



的文化因素，该墓葬属于平洋墓葬的中期晚段，年代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左右，比完工墓地要早，是目前在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分尾式骨镞，这种骨镞在平洋墓葬发现数量极少，说明此时来自外贝加尔的文化因素对这里的汉书二期文化遗存影响还非常小。

#### （5）来自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

砖厂墓地晚期墓葬 M107 随葬 2 件金丝拧绕成的耳饰，为用一根金丝对折后拧绕出一个立柱，对折处形成一个小环，金丝的一端压扁呈叶状，另一端完成圆弧状可插入耳孔（图三，2、3）。这种用一根金丝（或铜、银等金属丝）拧绕成的耳饰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相当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的遗存发现较多，常在拧绕出的环内穿挂坠饰，有的一端也压成扁叶状。西汉时期匈奴的以及含匈奴文化因素的遗存中也有少量发现，但是没有进一步发展。这种耳饰在汉书二期文化晚期遗存中被进一步创新，创造出拧绕出立柱、穿挂珠子、一端压扁呈较大的叶状三个新造型因素，并在西汉中期随着汉书二期文化的南下到达辽宁省北部和东部，被扶余人吸收后又进一步创新<sup>[57]</sup>。

#### （6）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

战斗墓地 M219 出土 1 件长牌形带钩，出于男性墓主人的腰部，说明是作为死者腰带上的实用部件下葬，而不是象征性的随葬品（图一三，4）。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长牌形带钩流行于战国时期<sup>[58]</sup>，但是在汉代仍可见到铁质的长牌形带钩<sup>[59]</sup>。

砖厂墓地晚期墓葬 M107 和 M115 分别出 2 件和 1 件椭圆形双梁铜泡（图三，1），这种铜泡见于西汉时期的汉墓，在高级别的汉墓中常见鎏金者，是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一种铜泡<sup>[60]</sup>。

在平洋墓葬只发现上述两种来自中原文化因素的器物，数量亦非常少，这说明中原地区的文化对平洋墓葬的影响非常小，这种影响很可能是间接的、通过其他人群的传递来到平洋墓葬的。

#### （7）外来文化因素的动态分析

平洋墓葬的早期墓所出青铜器明显可见主要来自于长城地带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诸遗存，其中来自冀北的玉皇庙文化的因素最多，其次是来自内蒙古东区的。但是这些来自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已经与嫩江流域本地的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早期墓葬的陶器绝大多数与当地汉书二期文化的陶器特征相同，大量使用当地特有的长扁铤骨镞，虽然以单人一次葬为主，但是已经开始吸收当地多人一次葬、二次葬的埋葬方式。这说明早期墓葬所见的来自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初来者，它们已经开始与当地原有文化因素融合。

至平洋墓葬的中期，长城地带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流行的齿状饰、双孔饰、动物形牌饰消失，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管釜的和釜孔式的铜镞、镂空球形铜铃、狗为主要用牲畜类方面，其中来自冀北地区的因素仍然为主体。但是较早期遗存相比，中期的来自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普遍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带管釜的铜镞较长城地带的管釜明显加长，部分镂空球形铜铃的柄部形状改变，狗虽然仍为最主要的用牲畜类，但是在晚段马成为与狗同等重要的用牲畜类，并且新出现使用猪、羊的头或下颌骨随葬的葬俗。在中期埋葬方式的变化最大，从早期的流行一次单人葬，在中期早段首先转变为一次双人或多人葬比例增多，到中期晚段变为二次多人合葬成为主要埋葬形式。二次合葬是嫩江流域春秋战国时期遗存流行的埋葬方式，平洋墓葬中期晚段变成以二次合葬为主，说明此时本地文化因素已经成为主体，来自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只在某些铜器上有所反映。

在平洋墓葬晚期，来自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已经所剩无几，只有一件镂空球形铜铃还保留着与年代久远的冀北玉皇庙文化铜铃的联系，来自冀北的以狗为主要用牲畜类的葬俗也发生明显改变，此时狗已成为出现频率最底的用牲畜类之一。

少量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在中期和晚期都曾出现于平洋墓葬，但对平洋墓葬只构

成零星的微不足道的影响，来自外贝加尔地区的文化因素情况也与此类似。来自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金丝拧绕成的耳环——在平洋墓葬晚期被吸收改造。

### (8) 一种可能性的推测

来自冀北地区的玉皇庙文化因素、主要与内蒙古东区有关的文化因素是平洋墓葬早期遗存的主要外来文化因素。冀北和内蒙东区不仅地理位置接近，而且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文化带诸区中文化联系最密切的两个区域。玉皇庙文化与狄人建立的代国和中山国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学术界认为该文化是狄人的遗存<sup>[61]</sup>。战国早期，赵国灭代国，玉皇庙墓地的年代下限亦为战国早期<sup>[62]</sup>；战国中期，随着赵、燕两国向北开拓疆土，冀北的玉皇庙文化在当地被燕文化取代，凉城一带的毛庆沟墓地出现埋葬习俗明显区别于北方民族的中原人墓葬<sup>[63]</sup>。玉皇庙文化在冀北被排挤之后开始向东、向北传播，在战国中期和中晚期，辽西努鲁尔虎山以东的三官甸、五道河子等墓地中玉皇庙文化因素明显增多<sup>[64]</sup>。平洋墓葬早期墓葬中出现的来自冀北和内蒙东区的因素，很有可能与这两地受中原势力排挤而促使当地文化因素向外传播有关。

除了本文已经提到的齿状饰等几种铜器，还有一类器物可旁证上述推测成立，即砖厂墓地的两种三足罐：一种三足罐颈部略内收，口略外侈，微鼓腹，见于早期墓葬 M174（图一四，1）；另一种腹略浅，有两个略突出于口沿上的半环形耳（图一四，2）。这两种三足罐除了颈部形状和两周戳印或珍珠纹装饰与同墓地的陶鬲相似之外，其他方面在当地相关遗存中找不到相似者，只与平洋墓葬部分明器化的小三足器形状有联系。但是在冀北和内蒙东区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遗存中有一种数量较少但很有特点的三足罐（亦称三足鼎），均颈部内收、侈口、鼓腹，也分为有耳和无耳的两种，无耳者见于毛庆沟墓地<sup>[65]</sup>（图一四，3），有耳者见于冀北葫芦沟墓地<sup>[66]</sup>和白庙墓地<sup>[67]</sup>，半环形耳亦略突出于口沿之上（图一四，4、5）。砖厂墓地的两种三足罐正与冀北和内蒙东区的两种三足罐对应，半环耳略突出于口沿之上的特征也相同。虽然砖厂墓地的两种三足罐与冀北和内蒙东区的形制还有一些差别，但是两地之间三足罐种类和形状的相似应该不仅仅是巧合。三足罐很有可能是与齿状饰等铜器同时到达砖厂墓地的南来的文化因素，只不过因陶器较铜器更容易接受当地制陶传统的影响，而使三足罐很快吸收了嫩江流域本地的传统使形制发生变化。

### 参考文献：

- [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平洋墓葬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2] 潘玲，林云. 平洋墓葬的文化性质和年代 [A]. 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 [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94~203.
- [3] 赵宾福. 汉书二期文化研究——遗址材料和墓葬材料的分析与整合 [A]. 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98~116.
- [4] a. 本文对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地带的分区根据杨建华先生的观点（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即“内蒙古西区指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地区，向北扩展到河套地区甚至阴山山脉的个别地区；内蒙古东区指以大青山的东段凉城、岱海为中心的地区”。本文对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地带遗存的断代也主要参照该专著。  
b.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 [J]. 考古，2009（3）：28~48.
- [5] 李逸友.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土的铜器 [J]. 文物，1959（6）：封三.
- [6] 鼓腹铜管在年代晚到西汉中晚期的宁夏倒墩子墓地发现2件，该墓地还发现2件其他形状的铜管。但是倒墩子的鼓腹铜管的腹部变成略扁的椭圆形，管壁增厚，凸棱不清晰，与长城地带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鼓腹管形制有一定差距，而且年代晚到西汉时期的此类铜管仅见于这一处墓地。因此，可以认为倒墩子的这2件铜管是长城地带春秋战国时期的鼓腹铜管流传下来的最晚形态，这种器物的

基本流行时间仍然是春秋战国时期。

- [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军都山墓地——玉皇庙.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 [8] 石岩. 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青铜镞研究 [M].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本文中关于北方地区铜镞形制变化规律的观点主要引自该专著, 以下文中只在注释中注明石岩先生该专著, 不再在文中一一说明.
- [9] 邱国彬. 内蒙古教汉旗大哈巴奇拉墓地调查 [J]. 北方文物, 1996 (3): 8~14.
- [10] 本文对教汉旗周家地墓地的断代根据王鹏硕士论文 (王鹏. 周家地墓地研究——兼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衰亡与流向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8 年硕士论文).
- [1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讷河大古堆墓地发掘简报 [J]. 文物, 2009 (6): 4~25.
- [12] 砖厂墓地 M154 也出一件 A 型陶鬲, 但是没有发表器物图, 为了慎重起见, 本文暂不将此墓归入早期墓葬.
- [13] 原报告对三足罐的描述不详细, 没有说明该墓地出土的 6 件三足罐中与早期墓 M174 所出的那件三足罐形制相同者到底有几件, 出于哪些墓葬, 所以无法判断早期墓 M174 和 M184 所出的三足罐是否是同一形制的.
- [14] 同 [2].
- [15] 同 [2].
- [16] 报告 65 页正文称曲颈壶有 15 件, 可分为 2 式, 但是接着介绍 I 式有 1 件, II 式有 5 件, 两者合计才 6 件. 查报告附录六“砖厂墓地随葬器物统计表”表明, M102 和 M111 分别出 1 件 I 式曲颈壶, 这样 I 式曲颈壶共有 2 件, 而不是报告正文所写的 1 件. 可见报告的正文有误. 本文以报告附录六的随葬器物统计表为准, 该表表明砖厂墓地出土 I 式曲颈壶 2 件, II 式曲颈壶 5 件, 合计出土曲颈壶 7 件.
- [17] 砖厂墓地 M133 发现有一件残支座, 该墓为多人二次葬, 除了残的支座, 该墓还出篦点纹陶片、陶器口沿等. 这些残损的陶器可能是迁葬时随填土等混入的早一时期的器物, 尤其是小三足器和支座体积较小, 残器容易随迁葬后的填土带入晚期墓葬. 因此本文根据出土完整器物特征将 M133 归为晚期墓, 而没有归入出小三足器和支座的墓. 为了慎重, 本文统计的出小三足器和支座的墓葬都为出土完整小三足器或支座的墓葬, 不包括只出残的小三足器或支座的墓葬 (M166 所出的是残的小三足器, M110、M130、M133、M144 分别出 1 件残的支座, 这 5 座墓葬都没有包括在内).
- [18] 发掘报告发表的 2 件砖厂墓地 AIII 式直颈壶的器物图形状差别较大, 本文不作分析.
- [19] 同 [5].
- [20] 王成, 沙宝帅.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发现青铜器 [J]. 考古, 2004 (4): 93~96.
- [2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凉城崞县窑子墓地 [J]. 考古学报, 1989 (1): 57~80.
- [22]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毛庆沟墓地 [A].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27~315.
- [2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 [J]. 考古, 2009 (3): 28~48.
- [24] 内蒙古博物馆,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 [J]. 考古, 1977 (2): 111~114.
- [2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 [26] 王为群. 河北隆化县发现的两处山戎墓群 [J]. 文物春秋, 2008 (3): 19~22.
- [27] 永昌县三处沙井文化墓地断代根据洪猛硕士论文观点 (洪猛. 双湾墓葬及沙井文化相关问题研究 [M]. 长春: 吉林大学 2008 年硕士论文. ).
- 玉皇庙墓地断代主要根据杨建华先生专著的观点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 [28] 同 [8] .
- [2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 燕下都 [M]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1996 .
- [30] a. 同 [8] .  
b. 同 [7] .
- [31] 同 [7] .
- 本文赞同杨建华先生将玉皇庙墓地断代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认识。玉皇庙墓地绝大多数墓葬分布于该墓地的北区和南区,北区墓葬中出春秋中期的青铜礼器,年代较早。北区墓葬开口于早期泥石流层之下,南区墓葬开口于早期泥石流层之上,因此北区墓葬早于南区墓葬。北区有 194 座墓葬,南区有 174 座,两者数量差距不大。因此可以以泥石流层为界,将北区和南区墓葬划分为该墓地的早、晚两期遗存。根据玉皇庙墓地发掘报告的分析,M174 是南区中年代最晚的一批墓葬之一,即是该墓地晚期墓葬中的最晚墓葬之一,因此 M174 的年代应晚到战国早期。
- [32] 同 [29] .
- [3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工作队 . 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秦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7 (3): 1~17.
- [34] a. 同 [8] .  
b.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展览馆 . 甘肃永昌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调查[J]. 考古, 1984 (7): 598~601.
- [3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德地区文化局,滦平县文物管理所 . 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现 [A] . 文物资料丛刊 (7)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1983 : 67~74.
- [36] a. 同 [5] .  
b. 杨建华 .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2004 .  
在海拉尔市谢尔塔拉农场也发现一件与平洋砖厂和范家窑子所出相似的蹲踞状虎纹牌饰,为非发掘品.
- [37] 同 [22] .
- [38]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1986 : 93 , 图六一, 1.
- [39] 同 [7] .  
河北隆化西南沟墓地也发现 9 件与玉皇庙墓地相似的站立状马形牌饰,见本文 [26] .
- [40] 同 [7] .  
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鹿形牌饰(或带饰),与冀北地区所出的两种鹿形牌饰(或带饰)形制相同,但是来源不明(鄂尔多斯博物馆 . 鄂尔多斯青铜器 [M]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 206, 207. ) .
- [41]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宣化县文化馆 . 河北宣化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J]. 文物: 1987 (5): 41~49 .
- [42] 贺勇,刘建中 . 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 [J] . 文物春秋: 1993 (2) : 23~40.
- [43] 同 [7] .
- [44] 陈信 . 河北涿鹿县发现春秋晚期墓葬 [J] . 文物春秋 : 1999 (6) : 31~32 .
- [45] 杨建华 . 再论玉皇庙文化 [A] . 边疆考古研究 (第 2 辑) [C]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03 : 154~163 .
- [46] 辽宁省博物馆 . 辽宁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 [J] . 考古 : 1985 (2) : 125~130 .
- [47] 同 [7] .
- [48] 同 [41] .
- [49] 同 [42] .
- [50] 承德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滦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 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群清理发掘简报

- [J]. 文物春秋: 1991 ( 2 ) : 15~30 .
- [51] 同 [7] .
-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 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 [J]. 考古: 1984 ( 5 ) : 417~421 .
- 虽然平洋墓葬的骨镞与周家地的都为长铤的骨镞, 但是这种骨镞是春秋战国时期东北地区中西部和西北部普遍存在的骨镞形制, 在同时期当地的其他文化类型墓地都有发现 .
- [53] 同 [9] .
- [54] 发掘报告没有将这类骨镞单独分型式, 只根据镞身的形状和尺寸大小与其他的扁铤、锥形铤的骨镞划入一个型式, 估计在砖厂墓地这种形制的骨镞也有可能不止 M121 所出这一件.
- [55] 潘玲 .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56] a. 潘行荣 .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 [J]. 考古: 1962 ( 11 ) : 590~591 .  
b.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 [J]. 考古: 1965 ( 6 ) : 274~282.  
c. 潘玲 . 完工墓地的文化性质和年代 [J]. 考古: 2007 ( 9 ) : 78~86 .
- [57] 潘玲 . 两汉时期东北地区和长城地带的三种耳坠 [A]. 新果集: 庆祝林沅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421~436 .
- [58] 王仁湘 . 带钩概论 [J]. 考古学报: 1985 ( 3 ) : 267~308 .
- [59]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 . 召湾和边墙壕清理的四座汉墓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0 ( 1 ) : 92~101 .
- [60] 同 [56] .
- [61] 林沅 . 关于中国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 ( 1, 2 ) : 127~141. (该文收录于林沅学术文集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 .)
- [62] 同 [45] .
- [63] a. 同 [22] .  
b. 杨建华, 洪猛, 曹建恩 . 毛庆沟墓地的两种墓葬所反映的不同社会结构 [A]. 边疆考古研究(第 8 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64~73 .
- [64] 同 [45] .
- [65] 同 [22] .
- [6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 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 [J]. 文物: 1989 ( 8 ) : 17~35 .
- [67]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 . 张家口市白庙遗址清理简报 [J]. 文物: 1985 ( 10 ) : 23~30 .

## Further Study on Pingyang Tombs

PAN-Ling

**Abstract :** Based on the synthetical analysis of the combination of bronze articles and the variation of funeral customs of 40 tombs in Pingyang tombs, the author divided them into three phases. The early phase of Pingyang tombs dates from the early to the middle stag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middle phase is approximately from middle and late stag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early stage of West Han Dynasty, and the date of late phase is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 of West Han Dynasty. The main external culture elements of Pingyang Tombs is Yuhuangmiao Culture element coming from the Jibei

area of the Great Wall belt. In addition to this, there is also culture element coming from other area of the Great Wall belt, mainly from the eastern area of Inner Mongolia. The proportion of external culture elements coming from the Great Wall belt in Pingyang Tombs is most large in the early phase, and clearly decrease in the middle phase, and become only very a few in the late phase. Apart from above mentioned, there is also a few external culture elements coming from trans-baikal area, Eurasia Steppe and Chinese Central Plain area.

**Key words :** Pingyang Tombs period the Great Wall belt Yuhuangmiao Culture

**收稿日期:** 2010-6-9;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 潘玲(1967-), 女(汉族), 黑龙江桦川人, 吉林大学副教授。